

许骥
著

我们香港的蜗居、蚁族、富二代

Tongbaoqing Danding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同胞,请淡定: 我们香港的蜗居、蚁族、富二代/许骥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308-09239-5

I. ①同… II. ①许… III. ①访问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6570 号

同胞,请淡定: 我们香港的蜗居、蚁族、富二代
许 骥 著

策 划 者 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
责任编辑 王长刚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67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239-5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序 怎样做个城市人？

潘国灵*

年轻作者许骥出新书，邀我写序，还提议了一个题目给我：“怎样做个城市人？”；我没多想便答允了。没多想是指题目，以为胸有成竹，怎说都是彻彻底底的都市人，可一旦开笔，却发觉茫无头绪。茫无头绪是因为，尽管我每天在城市呼吸，却鲜有把“怎样做个城市人”当作一个问题来思考的。或许，已经置身其中，就不会再想“怎样成为”。你已经被“抛掷”进了城市，从开眼之日，城市就是你的摇篮，你的底色，你的背景音乐，你的日常生活世界。如水之于鱼，鱼还会“想”它应该怎样游泳吗？

但想想又不尽然。不单是说许多人仍生活于农村，或经历着从农村向城市转型的过程（这不是我所熟悉的），而是，即便是一些已然生

* 潘国灵，香港小说作家、文化评论人，为多份刊物撰写专栏，并为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大学兼任本科及硕士课程讲师。著有小说集《亲密距离》、《失落园》、《病忘书》、《伤城记》，城市论集《第三个纽约》、《城市学2》、《城市学》，文集《爱琉璃》、《你看我你看你》，及主编《银河映像，难以想象》、《王家卫的映画世界》等。



同胞,请淡定

Tongbao, Qing
Danding

活于城市环境中的人,也未必就具备所谓城市人的精神特质。没错,环境影响心性,但两者常常是脱轨的,尤其于中国内地,硬件建设大跃进往往不成问题,城市的“基建”全有了,但所谓“城市人的特质”,常常好像还不搭配。由是观之,“怎样做个城市人”这一问题,就不仅只对于“介乎”、准备跨越门槛的人有意义;对于已然生活于城市的人,也许亦是值得思考的。何况城市恒常于变化之中。

“怎样做个城市人”至此稍稍转向,成了“什么是城市人特质”这问题。但进一步诠释前,我感到还有必要多加一个说明。当我们说类似“怎样做个读书人”时,我们说的大概是“读书人”或阅读的美好特质,但“城市人的特质”不然,有些当可看作“正面”(如文明人的素质、现代化的便捷等),其中也包括一些你不可简单定夺为好坏,超出好坏,或好坏并存,只能当作内涵气质来描述的东西。换言之,这不是,或起码不全然是一个“提升”、“变好”(或反之的“堕落”、“变差”)的问题。如果真有所谓由“非城市人”变成“城市人”这回事[如佐拉1883年的*Au Bonheur des Dames*(中译《妇女乐园》),写一个从乡间来到巴黎、年方二十的女子,经历现代百货公司洗礼而成为“城市人”],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转化”。城市人是一种现代变种。

如是者我进入城市人特质的思考。都说我们总是以差异来定义事物,那城市之于农村、乡镇,又有什么最基本的分别?社会学家朱克英(Sharon Zukin)对城市有一个颇一语中的定义:“城市就是一个陌

生人(stranger)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如果农村、乡镇的人际关系是建基于宗亲、邻里、互相认识紧密相连的网络(如今在一些欧洲小镇电影中仍可看到的),城市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却是“陌生人”。于大城市生活,陌生人的角色甚至比亲朋戚友重要。但如果纯粹互为陌生,关系并不微妙,耐人寻味的是,我们也把陌生人拉进自己想象的帷幕,同时又成为别人生活舞台的匿名演员,在地铁中,在街道上,在旅馆里,于虚拟的书面和微博;所有的戏码都是临时戏码,所有陌生人的相遇都是一次“错遇”,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场景置换,戏台随即瓦解。甚至我们曾经以为比较“恒久”的友侪、情侣关系里,也标示了晚期资本主义浪漫诗人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警句:transitory(过渡的),fugitive(逃逸的),contingent(偶然的)。城市人的“匿名性”造成现代人的疏离感,但吊诡的是,我们又同时受其荫庇;我们渴求表演,同时极爱隐匿。“没有纽带的人”(Man Without Bonds),当代杰出的哲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如是说,这是一种难得的轻省,同时又给予现代人无比的怅惘。城市人如果有一个“套餐”,其中的特质是“悖论”式的——你不能只爱亲密不要疏离(或反之),只要安定不要流动(或反之),只要陌生不要交往(或反之)。不,不可以,你要照单全收。从今天起,面对现实,抛开上几代人教你的“安身立命”、“脚踏实地”、“民族扎根”之类(你可能老早已不相信),改以矛盾综合语(oxymoron)来感思生活,如“皈依是在路上”、“流动的居所”、



“亲密的距离”、“陌生人的剧场”等，吊诡更接收现代城市的生存情状。如果不因此落入迟疑不定，或者偶尔可于持续的摆荡中提取生之力量。

由是我们又可回头说说城市的“物质性”。城市作为城市，当然有一些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诸如鹅卵石、街灯、喷泉（今时今日当是音乐喷泉了）、广场（今时今日当是“时代广场”了）、步行街、摩天大楼、LED灯、钢铁、玻璃橱窗、地铁、高铁、国际机场（有些几个城市共享一个）；古城有城门，教堂城（cathedral city）有教堂，大学城有大学，等等。中国内地一、二线城市，这方面真是几年一个大跃进。但城市发展到今天，我们又知道，所谓“物质”又是非常“符号性”的。后现代城市，最大的物质生产就是“符号”本身——诸如无数的品牌（brand）、形象（image）、品味（taste）、生活格调（lifestyle）、城市名目等，以此来维系着一个景观化、节庆化的消费主义社会。城市人于此真的成为“最高档”的变种生物——因为最高档的“物质”就是符号本身；只有人类，才可将符号把玩得如此天衣无缝，以此来推动城市人那缺乏（lack）与欲望（desire）互相依存、亢奋与疲惫共生如老鼠滑轮般的循环机制。

于此，情况也变得混杂、暧昧、吊诡起来。我们不能返回、再认同简单把城市看作毒瘤的“反城市主义”（anti-urbanism），以至法兰克福学派把商品看作“虚假需要”（false need）的判词；但你要我无限拥

抱“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种盲乐观口号又是没有可能的(唯有把它置换为“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方可接受——仅当作一种期许。城市人本性跟周遭物事保持距离,包括一句简单的官方语)。情况错综复杂多了,因为我们有距离地批判的消费主义、符号经济,同时也是替城市人生产源源不绝的愉悦、快感、意义之场域。对此我们并非全然无知,尽管未必可说出所以然来。问题是我们已走入了一个“No-Exit”的世界——你即使尽量过“简朴”生活,也不可能脱离消费社会的城市“母体”(matrix)——因为所有的城市互动、自我表现以至身份认同,都不可能拐过符号之网而另起灶炉。身在城市,没有场外,所有批判都成了同谋式批判(complicitous critique)。我并没说因此尽皆虚无。刚刚骂了连锁店一通,经过星巴克时又买了一杯拿铁,我分裂但我不虚伪,你不能怪我。

如是者说着说着也可串上许骥这书的核心。许骥这书之特别,是不止访问了十位香港文化人,还替他们各自配对了一个议题,计有“蚁族”、“粉丝”、“蜗居”、“考研”、“富二代”、“剩男剩女”、“拆迁”、“创业”、“微博”等。年轻的许骥热血方刚,他关心社会问题,企图以香港的城市化经验,向香港有识之士取经,来给内地城市正在发生的奇难杂症把脉断症,这份期许与心意,从《同胞,请淡定》这书名可以得知。他当然也明白即便是香港曾经历过的问题,时空不同,历史轨迹有别,问题也就完全不同了。一如理想主义的失落,香港兴许也没啥理

想,但跟内地的变化又自不同。又如“反城市心态”,香港早年亦曾出现,但跟内地几十年间由大规模“反城市”,一下子变成全面拥抱城市的一百八十度转向,不可同日而语。也有人说中国短短几十年经历了外国的几百年,没完全现代化便径直走入后现代了。如此看来,经验的借鉴不仅是前行后发的次第问题,还是时空压缩、转换而生出无限扭曲变形之事。中国城市是世界突异的变种,想来置身其中的城市人也无可幸免。而且,单看以上议题名字,一如在香港大行其道的“80后”,不少都是肇出内地,自北而来的。说以香港经验来让内地同胞少安毋躁,其实这书所言,也值得香港人“淡定”一番。

观照城市的眼光有很多,许骥显然是带着强烈问题意识来关切内地城市发展的。有趣在访谈之中,被访者不时会把先设的“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转化、有距离地审视,譬如“蚁族”不是问题而可能是一种现象,“富二代”不是问题而可能是一种标签,粉丝本质其实是媒体操弄问题,等等。如是者,在容许不同观点交锋、转换或回返话题、边说边探讨,提出观点但不一定作结论的开放对话中,我们看到议题的多面性或多层次。同一个被热话的议题,可能是社会问题,可能是新现象,可能是伪概念,可能是固有事物的新命名,可能是媒体生产的消费符号。我不是说所有东西混同为一而再无社会问题需要正视,而是,情况往往比想象中更纠缠不清,即便是一些明显的社会问题,知识分子认为理应解决,落入市场机制却可能是不可多得的

“资本”。究其实,我们的城市,根本就是需要以压力、焦虑、问题来运作的,越是“城市”越精于此道。去到一个极端,甚至可以说,问题是有待制造多于有待解决的。城市表面常常摆出化解问题之姿,但与此同时催生了各种城市需要(诸多心灵治疗师、life coach、社会专家等)。另方面,一个被热议的题目是不是问题,往往也去到没有“本然”可溯的地步:第二轮的媒体再现僭越界线成为真实本身——如布什亚说到的先有药才有病(现代精神科药物不少如此);同理,如果媒体说“剩男剩女”有病,在大众接收中卷起这病感风暴效应,那它就是病了。不同市场力量自会参与其中,一边提出解决之道一边延续生病的周期,直至它降温而由其他状若现象/问题/标签的东西取代。生生不息,连病痛也是生机,这也是城市人的精神特质之一。

是为序。祝许骥此书成功。

2011年8月8日于清水湾

自序

2005年,我放弃在香港的学业,来到杭州读书。我大学的四年光阴,是目睹内地社会巨变的光阴。初来杭州时,我真是爱极了这里,立志要在这里定居。可是,当我毕业时,杭州的房价已经涨到几乎可以和香港比肩的程度;而在杭州工作的收入,却远远低于香港。加之对内地的升学、就业、文化、舆论、人际关系等方面的考虑和担忧,令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要不要留在内地这个问题。

不仅是我有这样的困扰,我的同学、朋友同样如此:忍受蜗居、蚁族、考研等种种的压力,抗争、忍受,生活、奋斗。我的一个同学,在毕业后不到一年时间就意外身亡了——他是蚁族,住在农民房里,因劣质的电热水器漏电触电身亡。一想到身边不知道还有多少和我一样的同胞,如此华丽的年龄,如此弱小的肩膀,却要扛起如此沉重的担子,我真是欲哭无泪,觉得一定要做点什么。

2009年末的一天,我和周为筠兄闲聊时,不知怎么说起这样一句话:“我们现在所经历的,香港早已经历过。”由此,我便产生了一个想法,写一本让香港人作为“过来人”,给大陆同胞提供一些经验的书。



同胞, 请淡定

香港在文化上的地位,实在太为人所忽略了。谈起文化,人们往往只知有大陆和台湾,香港则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十分尴尬。但实际上,绝对不能轻视香港。王德威、陈平原、许子东三位教授合编的文学论文集《一九四九以后》中说: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三江分流,大陆一支、台湾一支,其中的交汇点,就是香港。文学上如此,文化上更是如此。香港以其包容、开放的精神,成为必不可少的“文化要塞”。在诸多描写香港的文字中,龙应台教授的视角颇为独特。她赞美香港人面对所有事物,从来不会一拥而上:

香港却一直是一个分众社会,由无数个小圈圈组成,圈圈之间相当疏离。以英语思考的精英和大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有两套截然不同的话语。知识精英和街市里买菜卖菜的湾仔小市民之间,好像互不相干。湾仔的小市民和深水埗的大陆新移民之间,俨然又是两个世界。商人主宰着社会政策,却又和所谓社会有深深的鸿沟。水静,才能流深,香港却一直处在浮动的历史中。中国一有战乱,人就涌进来;战乱一过,人就流回去,或者,稍做不得已的停留,然后奔往更向往的西方。太多人将这里当做跳板或客栈,无数的移民流出去,又有无数的难民流进来;移动中的“分众”一直没有足够长久的历史时间沉淀,“练习”互动,从而变成有共识的“大众”,有默契的集体。殖民者为了统治的便利,

更不会乐意去培养一个有共识、有默契的民间社会。

在龙教授的笔下,香港的价值跃然纸上,她说香港人“冷”。我理解的“冷”,不是“冷漠”而是“冷静”,客观而公正,见过大世面:做过“亡国奴”,唱过“狮子山”,当过暴发户,不再有卖弄的“雅兴”。有了这样的了解,就更坚定了我创作的信念。

当然,这一想法实行起来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后来又经过了多次修正。譬如,我曾想过自己去翻阅大量关于香港社会发展的材料,写一本历史随笔;也想过,由我来主编,拟出题目,请香港的年轻朋友来写。但是,这些想法都因为一些现实的原因而一一被自己否定了,最终选择了一种最直接的方式——访谈。

访谈对象的选择标准有三点:第一,名人,因为名人大多见多识广;第二,要对内地和港澳台地区情况都十分熟悉;第三,不必仅限于年轻人,如培根所言,年少者多激情,年长者多经验,“激情”和“经验”都是我们所需要的。

继而,我罗列了几十个题目,几乎涵盖了我所能想到的当下年轻人关心的所有社会热点问题,再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确定了十个主题,有关于生活的、就业的、升学的、情感的、住房的,甚至还有关于媒体的。十个主题在手,我便像拿着十位姑娘的照片,做起“红娘”,开始物色她们的“如意郎君”:



同胞，请淡定

Tongbao, Qing
Danding

欧阳应霁——这个以让家居更美好为志业的大设计师——谈“蜗居”；

马家辉——这个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学博士——谈“蚁族”；

邓小桦——这个以保卫天星码头出名的新锐作家——谈“拆迁”；

林奕华——这个长久以来关注都市男女情感问题的大导演——谈“剩男剩女”；

邓小宇——这个从小就是童星的大作家——谈“富二代”；

汤祯兆——这个曾经十分成功经营电影周边产品商店的日本通——谈“创业”；

许子东——这个岭南大学的大教授——谈“考研”；

李照兴——这个往来于两岸三地的媒体人——谈“微博”；

廖伟棠——这个关心人类比关心自己更多的大诗人——谈“信仰”；

梁文道——这个拥有千万粉丝的佛教徒——谈“粉丝”。

这十个人，不敢说他们与这十个问题是“天生一对”，但也是“地造一双”。在为时近半年、频繁穿梭于各地的采访过程中，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总是能够从他们的口中听到真知灼见。他们的视角，透露

出洗尽铅华之后的淡定自如，有批判而没有焦虑，有愤慨而没有暴躁，有自信而没有自满。比如，马家辉在谈“蚁族”时说：“蚁族根本不是问题。”欧阳应霁在谈“蜗居”时说：“蜗居是一种很好的训练。”这些话，不是身在炼丹炉里能说出来的，必定是出了炼丹炉之后，才能轻松地说一句：“哈哈，在炼丹炉里有什么不好？它能给你一双火眼金睛！”

当然，香港也不尽是好的。香港作为一个拥有七百万人口的城市，有许多社会问题。我又想起说龙应台教授说过的一段话：

香港现代化的进程中，要拆掉那么多的老街，换成商场、酒店和大厦，其实是对文化和历史的破坏，我还记得十多年前去欧洲，第一次被一个老牧人和他的五百多只羊堵住了路口，那时候我就在想，原来这就是欧洲。其实高科技和现代化并不是指要用高科技将我们的一切历史和古老都替换掉，而是用高科技，将我们的历史保存得更好。现在香港据说每年都吸引一千万内地游客到香港来，如果香港全部变成了“又一城”，我相信，这个吸引力是会消失的。

这就是香港的问题之一。我们看了这样的教训，会想重蹈覆辙吗？很遗憾，我们今天在内地看到的情况，正是不少城市在走香港的



老路,无数古迹被拆掉建成商场,走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感觉似曾相识。内地的经济学家喜欢讲“后发优势”,后发的优势何在?就在于能从像香港这样的“已发展社会”(developed society)中吸取经验和教训。香港做得好的,我们借鉴;做得不好的,我们回避,学会淡定、冷静、理性地看问题。这就是我的一点小心愿,也希望这本书能给各位读者带来一些思考。

是为序。

2011年2月13日

写于古处州浙江丽水

序 怎样做个城市人？ 潘国灵

自序

欧阳应霁：“蜗居”是一种很好的训练 001

马家辉：“蚁族”根本不是问题 029

邓小桦：所有拆迁都要跟幸福有关 053

林奕华：时代不鼓励思考造就“剩男剩女” 079

邓小宇：“富二代”，走着瞧 111

汤祯兆：要创业，要理想，不要想赚钱 137

许子东：考研不如去留学 165

李照兴：微博会把人变蠢吗？ 191

廖伟棠：找寻失落的“理想主义” 217

梁文道：我宁愿没有粉丝 243